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抗战时期湖南 经济损失和人口伤亡研究

萧栋梁 主编

013967933

K265. 06
76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抗战时期湖南经济损失 和人口伤亡研究



北航

C1675573

K265.06
7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时期湖南经济损失和人口伤亡研究/萧栋梁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8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ISBN 978-7-5097-4966-1

I. ①抗… II. ①萧… III. ①抗日战争-损失-史料-
湖南省 IV. 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3728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
抗战时期湖南经济损失和人口伤亡研究

主 编 / 萧栋梁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赵 薇

责任校对 / 孙 彪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mm × 1194mm 1/32

版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966-1

定 价 / 45.00 元

印 张 / 13.125

字 数 / 350 千字

本书如有破

版版权所



北航

C1675573

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编辑出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名单

顾问 王忍之 郭永才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任 何秉孟

委员 蔡文兰 孙新 谢寿光 徐辉琪
王正 杨群 徐思彦

执行编委 王正 杨群

编务 周颖昕

学术委员会

主任 张海鹏

委员 王桧林 王效贤 关捷 刘楠来 张宪文
张振鹍 胡德坤 黄美真 解学诗

总 序

王忍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为了以历史事实教育中日两国的年青一代，主持编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在内阁发表讲话，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同年，日本政府实施为期十年以亚洲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和平交流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环，日本外务省决定在日中友好会馆内设立日中历史研究中心，并且希望我国提供协助。中日双方有关部门通过协商方式确认了如下原则：在切实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中方同意接受日方的要求，提供必要的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我国外交部的委托，作为协助日方研究的中方窗口，与日方联络、协调相关事宜。

1997年8月，日中友好会馆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要求就协助进行历史研究问题进行协商，提出“只有作为受害者、抵抗者中国的参与，历史研究事业才能达到所期的目的。这点正是需要中国协助的”。日中友好会馆还表示，愿意将该馆的相关经费拨出一小部分交中方使用。经过协商，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认识。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正式建立了“中日历史研

究课题”，通过课题指南形式，在国内公开招标研究者。课题招标范围在1874~1945年，着重研究日本侵华的历史以及这一时期与此相关的中日历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对课题申请进行评审。经评审通过的课题，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视各不同课题的内容、工作量的大小给予经费资助，以助成其研究计划。

这样的年度课题招标，从1998年起，每年进行一次，每次约有15~20项课题申请得到通过。最早通过的课题，有的已经完成，并通过了结项手续。为了反映中国学者有关近代中日关系历史的研究成果，使它能被社会所了解，充分发挥它进行学术探讨、揭示历史真实的作用，以便今天的年青一代了解在中日关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创痛的事件，我们决定从这些成果中选择一部分出版，总题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同时，文库也包括国内学者撰著的一些涉及中日关系的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力图向中国年青一代，也向日本年青一代提供认识历史本来面貌的真实材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所谓历史认识问题不再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大障碍，希望中日关系向着睦邻合作、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真正发挥东亚两个近邻国家之间经济上互补互助、文化上互相学习尊重的精神，在难免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永远不诉诸战争。

是为序。

前言

“抗战时期湖南经济损失和人口伤亡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立项资助的课题。为什么选择这一课题呢？根本原因是面对战后日本右翼不断掀起否认和美化侵略的逆流，受到日本政府的纵容支持，造成军国主义思潮泛滥的严峻形势，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深感有责任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残暴罪行和造成巨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历史真相展现在世人面前，以戳穿日本右翼的谎言；警示后人，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为支持日本人民反对军国主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留下史鉴。

日本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1932年发动一·二八事变，直到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造成了中国人民空前的民族灾难，军民伤亡3500万人，经济损失6000余亿美元，这血泪斑斑的侵华罪行，早已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特别是八年全面侵华的血腥罪行已被同盟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发动战争罪、侵略罪、反人道罪，判处7名甲级战犯绞刑。1951年《旧金山和约》第11条又特别写明：“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争罪法庭之裁判”；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也写道：“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

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大多数人也强烈谴责日本侵华罪行，不少当年参加侵略战争的日本军人也真诚忏悔战争罪行。但是，包括不少日本政要在内的右翼势力妄图推翻东京审判的铁案，一再掀起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不断参拜靖国神社，推动军国主义思潮日益泛滥的逆流，严重阻碍中日友好关系发展！

日本右翼早在东京审判之后不久，就掀起了为被惩处的战犯评功摆好、树碑立传、收集遗骨、修建坟墓的翻案逆流。1957年甲级战犯岸信介出任首相后，极力扶植右翼势力，催生了一批新的右翼组织；1960年东京热海伊豆山为被判处绞刑的7名甲级战犯修建了“殉国七士墓”；1978年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作为“昭和殉难者”置入“靖国神社”，连1000多名乙级和丙级战犯也合祠其内，供人膜拜；1980年后又在当年的刑场和九州分别为死刑犯修建了坟墓与“大东亚战争阵亡者之碑”。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后，多届首相，阁员、议员等前往参拜，发表否认侵略的言论，妄图推翻东京审判的铁案，为军国主义招魂；1988年因“失言”被迫辞职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发文称：我们必须从“违法”的东京审判中摆脱出来；众议院议长清濑一郎攻击“东京判决”是“谎言”。在此前后，许多右翼分子撰写出版了《自虐史观的分析》《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等大批图书，为翻案逆流推波助澜。1989年日本右翼团体发展到840个，12万多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以历史问题为突破口，通过歪曲历史，美化侵略，宣扬极端主义的思想意识，推动国家政治、国民情绪、社会舆论趋向保守右倾化。在思想理念上，右翼提出“发扬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皇国民族国家”，甚至“尊王攘夷”“神道日本”等战前右翼的口号，以“皇国宪政党”“皇道青年会”“大日本报皇会”“皇道维新塾”等军国主义色彩深厚的右翼团体增加起来。在中日关系方面，日本右翼大肆鼓噪“中国威胁论”，要求在领土和资源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在历史问题上美

化侵略战争，肆意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2005 年日本右翼分子向中国驻大阪领事馆投掷燃烧瓶，骚扰中国驻东京大使馆。在内政上，右翼团体大肆批判现行政治体制，全力推动日本政治社会思潮保守右倾化。1995 年，右翼动员 200 多个团体 2100 多人，出动数百辆宣传车在东京街头游行示威，反对国会通过“不战决议”。特别是右翼势力不断向政治文化领域渗透，参加右翼政客组成的“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和“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同年，由 100 多名国会议员组成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出版了否定日本侵略历史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声称：日本当年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和发动九一八事变是“为了维护日本的正当权益”；“七七事变”，“不是日方挑起，而是中国军队干的”；“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东京审判违反了国际法”；“大东亚战争”是把中国从西方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是“自卫战争”；等等。1997 年成立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委员会，网罗的日本右翼达 1 万余人，还有企业财团支持，每年要组织上百次否认侵略的集会，近几年出版了百万册以上否认侵略的图书，将“南京大屠杀”“慰安妇”“731 细菌部队罪行”从教科书中删去，于 2002 年通过了日本政府的审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全盘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将承认判决的历史观称为“自虐史观”，经常开会否定日本侵华史。1997 年成立的“日本会议”更是具有法西斯色彩的右翼组织，坚决主张修改“和平宪法”，维护天皇的至尊地位。

邓小平同志 1987 年与日本友人谈话时提出，要“警惕日本极少数人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撰文指出：“准许日本再派兵到国外，就好像拿巧克力味的烈酒给醉鬼喝，一直不沾唇的日本人一旦喝上，要阻止他们就难了。”“我们虽然相信（日本）年青一代的价值观已经变了”，“但是我们凭哪一点可以保证，他们在陷入绝境的时候，如石油或市场的道路被截断，不会祭出他们祖辈的那股子狂热？”就在我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 65 周年

的2010年8月12日,日本极右翼组织“一水会”会长木村竟邀请欧洲法、英、奥、匈、意、比、葡等9个国家的极右翼政党和政客20人到东京开会两天,商讨“合作”建立极右翼政党的国际联盟,以应对发达国家出生率低、大规模吸引移民而增加的“威胁”。他们根本否认日德法西斯暴行,法国国民阵线党首勒庞曾说纳粹德国对法国的占领“并没有什么特别不人道”,这次又说“战犯不是专门属于战败国,胜利者中也有战犯”,“那些轰炸广岛、长崎的人也是战犯”,根本否认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界线;日本极右翼分子木村更是全盘否认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尤其是南京大屠杀和随军慰安妇的事实,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他们于2010年8月14日参拜了靖国神社,称参拜是为了向“以身殉国者”表达敬意。他们还想从勒庞在2002年法国总统竞选中闯入第二轮,匈牙利、奥地利等其他欧洲极右翼政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在本国议会和欧洲议会均有席位,取得参政夺权的经验,达到左右本国政局的目的。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

当前,不仅日本右翼有执掌日本政局的图谋,而且日本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危险也渐露端倪。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前后,就加速向军事大国迈进的步伐。日本军费早已跃居世界第二,国防预算2000年达50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军费支出国,其军事实力不仅已超过俄国、中国,而且在不少方面超过美国,拥有扫雷技术、反潜作战、常规潜艇、F-2战机、高技术导弹等“七个世界第一”;特别是突破“无核三原则”,发展核武器,积累了制造1000~2000颗原子弹的核能料;尤其是1991年打着“维和”旗号,将自卫队开进海湾以来,多次将自卫队开赴战争地区。2003年国会通过“有事三法则”,认定首相可以不经国会同意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2000年自民党提出宪法第9条修改案,明文规定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2004年又推出“新防卫计划大纲”,把矛头对准中国;2005年推出《宪法修改案》将“自卫队”

改为“自卫军”；日美发表《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联合声明》，使日本“挟美制亚”变得更加嚣张。日本政府还纵容右翼政客支持“台独”，日本政要更于2005年2月宣称“日美同盟的防卫范围，当然包括台湾地区在内”；日本政府于2005年2月将日本右翼在钓鱼岛上建造的灯塔定为“国有资产”，由海上保安厅接管；而且日本文部省批准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公然将钓鱼岛划为日本领土，挑衅钓鱼岛主权。

江泽民同志199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能否认真反省‘二战’时期的侵略罪行，关系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也关系到日本今后走什么样的道路。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是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之一，歪曲历史将有害于中日两国发展长期睦邻友好关系。这些年来，日本国内一再出现的否认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言论，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严厉谴责和高度警惕，也势必引起日本国内人民的不满。日本只有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深刻忏悔侵略罪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赢得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的谅解和信任，也才能防止悲剧重演。”胡锦涛同志200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只有不忘过去，记取教训，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我们希望日本政府和领导人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维护中日友好、维护亚洲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以严肃慎重的态度处理好历史问题，把对那场侵略战争表示的道歉和反省落实到行动上。”我们希望日本政府接受中国领导人的劝告，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坚持通过对话、平等协商，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分歧，加强两国在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加强民间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扩大共同利益，特别是要以正确的历史观

和真实的历史教材教育和引导日本人民尤其是年青一代，从而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本书在收集整理大量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抗战时期日军给湖南各地造成的经济损失与人口伤亡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统计，概括其特点，进而得出总体性结论。限于材料来源和作者学识，书中各项数据定有疏漏之处，敬祈识者指正！

本书由萧栋梁主编，各章节撰稿人分工如下：

萧栋梁 前言、第一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二章第一节第一目，第四章第一节第一目，第六章导语及各节、目资料来源

桂新秋 第二章

王文珍、朱柏林 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

陈清林 第六章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日军大举侵湘前湖南现代化进展概况	1
一 20 世纪 30 年代前中期湖南工农业的曲折发展	1
二 抗战前期和中期湖南经济迅速发展	19
第二章 日军飞机轰炸所致损失概要	38
一 日机轰炸湖南各地概况	38
二 日机轰炸交通要道和战略据点举要	50
三 日机轰炸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举要	56
四 日机轰炸驻湘军队和军工设施举要	69
五 日机轰炸文化教育机关和设施举要	76
第三章 日军在湘发动六次大会战造成损失举要	82
一 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的损失	83
二 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的损失	86
三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的损失	91
四 常德会战中的损失	94

五	长衡会战中的损失·····	101
六	湘西会战中的损失·····	113
第四章	日军在湘制造的重大惨案述要·····	122
一	日军屠杀千人以上的特大惨案·····	123
二	日军屠杀千人以下百人以上的大惨案·····	133
三	日军屠杀百人以下十人以上的惨案·····	143
四	日军在湖南制造惨案的特点·····	158
第五章	日军强奸妇女、发动细菌毒气战综述·····	164
一	日军对妇女实施性暴力概况与特点·····	164
二	日军在湘实施细菌毒气战举要·····	192
三	战时湖南防治疫病概况及防疫经费剧增·····	216
第六章	抗战时期湖南财产、人员损失总汇·····	224
一	全省财产总损失·····	226
二	省级各机关团体学校及事业单位损失·····	227
三	全省各专区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总况·····	253
四	各县人口伤亡及财产损失情况·····	256
五	全省各市县人民团体财产直接损失情况·····	268
六	全省各市县间接损失·····	295
七	战时人力损失举要·····	320
八	长沙大火损失估算·····	332

第七章 抗战后期湖南经济的破产·····	335
一 抗战后期湖南工矿业의 衰退和破产·····	335
二 抗战后期湖南农业的衰退·····	342
三 抗战后期湖南财政的崩溃·····	345
四 沦陷区经济的衰退和殖民地化·····	348
第八章 结 论·····	357
一 日军侵湘与反复破坏概况·····	358
二 战时湖南经济损失的考证与认定·····	363
三 战时湖南人口伤亡的考证与认定·····	376
四 日军侵湘对湖南现代化的重创·····	395

第一章

日军大举侵湘前湖南 现代化进展概况

一 20 世纪 30 年代前中期湖南工农业的曲折发展

20 世纪 30 年代的前期和中期，湖南政局处于相对稳定阶段，省政当局为巩固其统治，在某些经济领域采取过一些发展实业的措施。农业方面虽有相当一部分仍呈衰退趋势，但粮食等主要部门，在忽起忽落中缓慢地发展，商品性生产亦有增长。传统轻工业大多萎缩衰败，技术落后，基本上处于手工作坊阶段。但在国民党猖狂反共的历史条件下，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公路、电信事业迅速发展；与此同时，矿冶业、部分轻纺工业以及比重很小的机械工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从而出现一个工农业生产在曲折中发展的新时期。

（一）主要农业经济部门缓慢发展

这一时期的湖南农业经济，部分地出现衰退趋势，粮食生产和相当一部分其他农作物生产，在忽起忽落、徘徊停滞中有缓慢发展，而农业商品性生产则有所发展。

部分农业经济衰败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部分农村副业崩溃。这可以一度兴盛的土布、席子、石蜡、茶叶、烟草为例。湖南土布业原本发达，是遍及全省农村的重要副业，自外国棉花、棉纱输入后，农民不但不能恃为副业，而且不得不设法去买洋布，故湖南棉织品输入价值每年常在 1000 万两银以上，成为最大的进口货，造成土布业衰落。临武县龙须席是该县农村妇女的主要副业，每年可收入 20 万元，并运销广州、上海、杭州、南洋等地。因世界经济危机，价格惨跌至半价，致使草织业崩溃。该县的石蜡原运销粤、桂，每年可售 20 万元，1933 年受洋蜡倾销影响（洋蜡每 100 斤仅售 30 元），价格由每百斤 200 元跌至 100 元左右，而且销路疲滞，造成生产衰败。湖南茶叶 1890 年前后年输出 100 余万担（折 200 余万箱），1913 年前后仍出口 180 万箱以上，1928 年减至 20 万箱，而且价格越低，出口越减，至 1929 年售出不到 6 万箱。郴州烟草过去可产 300 余万斤，对当地农村补益甚大，自纸烟盛行，土烟销路锐减，1932 年降至 200 多万斤。

地价下跌。据中央农业试验所统计，湖南水田地价以 1931 年为 100，则 1933 年降为 93，次年惨跌至 32。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国内经济回升，1935 年升至 94，1936 年再升为 96，仍低于 1931 年。平原旱地与山坡旱地地价升降的幅度，大体与水田地价类似。3 种地价在 1931 年后呈直线或曲线下降之势，6 年之内下降 4%~9%。地价下跌说明自耕农、半自耕农乃至地主富农，“无不希望卖去土地，以取得现金而减轻负担”，^①反映了农业生产确有衰败。

部分耕地荒芜。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所载，1913~1933 年，湖南等 8 省耕地，无论是固定

^① 陈瀚生：《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见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论》，黎明书局，1934，第 240 页。